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

张艳涛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蕴涵的公共性维度关注不够,因此有必要从哲学的高度作进一步的研究。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的关键是深入把握唯物史观的内涵,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所言的“公共性”的基本涵义。马克思通过“人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超越,“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超越,“我们”对“我”的超越,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在21世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的时代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8)06-0001-07

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再度成为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这对于发展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和主题的理解,还有助于深化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21世纪还有哪些理论生长点?21世纪的中国能为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新的时代和实践来解答。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与世界观: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它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重视人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强调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的人生存与发展的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发展命运,强调规律性与规范性的辩证统一。然而在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意涵。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不可忽视的公共性维度,科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是发展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生长点。

一、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

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的关键是深入把握唯物史观的内涵,讲清楚“公共性”和马克思主义所言的“公共性”的基本涵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比同时代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分析得更透彻。唯物史观注重从社会关系和历史变迁的维度考察人的活动及其现实意义,强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人的主体性与公共性,即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的生命力不仅应该在理论上表现出来,也应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毕竟,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更主要的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发展,有其内在“文本”的原因与外在“解读”的动力。唯物

收稿日期:2018-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16BKS093)

作者简介:张艳涛,男,黑龙江庆安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观具有真理性与合理性,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则与精神,即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把唯物史观表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正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内在统一。唯物史观不是纯粹理论思辨的产物,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唯物史观为人类破解“历史之谜”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以社会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界现实的历史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马克思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开辟出哲学发展的新道路。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这两大发现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共同推进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因此,马克思的逝世对于“历史科学”是不可估量的损失。“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从物质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中深刻揭示了现实问题的世俗基础,揭示了历史的发源地。”^[6]

历史是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人不仅是历史的剧作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剧中人。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角度对公共性做出了规定。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虚假公共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主体(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实践过程(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目标(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三个维度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一方面,公共性是社会生产实践的公共性,包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产品、共同实现个人价值,这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虚假的自由个性。另一方面,公共性包含对私人性的辩证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了人的异化,其结果导致社会变为“虚幻的共同体”。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的目的就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还是“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无论是“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还是“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无论是“两个必然”,还是“两个决不会”,都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不是泛指全世界,而是特

^① 马克思是思想家、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统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 公共性维度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思想更为丰富的科学内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4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指西欧。因此,马克思坚决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① 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7] 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8]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世界交往”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都具有公共性维度,在21世纪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有助于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

在马克思之后,阿伦特从人的行动与语言的公共性维度概括出存在主义的公共性,哈贝马斯将公共性阐发为主体间商谈伦理的公共性,罗尔斯则提出在无知之幕后建构公共理性并以此限制人的行为,但他们都没有超越马克思,只是对马克思的公共性理论进行了部分延伸和拓展,使之更加正视人性之弱点、更为契合新的时代精神。在21世纪破解人类共同难题,需要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引导人们更多地从公共实践、公共利益、公共需要、公共意识、公共目标来认识和破解发展难题。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具有公共性维度,这种公共性维度不仅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在21世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协调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新思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从主要关注“我”到更加重视“我们”,培育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精神,彰显人类生活的公共性维度。

二、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的出场路径

在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方面,马克思无愧于“千年第一思想家”的荣誉。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真正意涵,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即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深入到历史的深处,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强调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命运。“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自在的生成过程,也不是一个毫无规定性的人的自主性生成,而是两者的‘主客体的辩证法’,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9]

人类的生活世界可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部分。马克思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决不是向私人领域的“龟缩”,更主要的是向公共领域的“挺进”。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发现: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满意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认为政治与哲学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10]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自觉地把“自身完美”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认为“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11] 可见,自青年时代开始马克思就不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理解为“一种职业”,而是理解为“一种事业”。后来马克思逐渐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将理论视角投向“现实的个人”和“物化的社会”,逐步推进到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晚年的探索主要是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的:在时间维度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回溯到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在空间维度上突破“西欧”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社会,考察俄国、印度以及中

^① 实际上每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选择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① 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价值,顺应世界革命重心东移(西欧——俄国——中国)的新趋向,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2]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包含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奥秘。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载体,而且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并不是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历史是一个过程——它同一切别的自然过程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人追求其目的的过程。马克思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起来,自然成为“人化自然”,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的扩展。只有站在当代实践格局上,对以前的历史才能够真正理解。在21世纪,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共赢中共存。这就要求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要兼顾别国发展,最终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繁荣与安全共同增长,而不是分离。

(一) “人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超越

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蕴藏着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整合与超越。黑格尔曾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相互需要,通过法治作为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手段,并通过一种外部秩序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13]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博弈的战场,国家则是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力量。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历史地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中世纪的“领域合一”演变为近代以来的“领域分离”是历史性进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现实道路。但是,不宜过分夸大这一“领域分离”进步的意义,毕竟,市民社会还不完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要形式,要想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还需要进一步超越市民社会,深入到人类社会。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引:“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4]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之所以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原因在于人类社会是由现实的个人组成的、超越“市民社会”中物化关系的、以人类自由解放为旨趣的“真正的共同体”,而“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 可见,人类社会超越市民社会的私利性,彰显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是大势所趋。

(二) “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超越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人类历史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历史,即进入普遍联系的历史。所谓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系统值。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总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在联系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契机,任何独立发展都已成为不可能。世界历史形成后,其社会的深层结构即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在世界历史形成以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五种形态依次更替)。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民族历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合力”效应,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去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这样就给自己带来“后发优势”。实际上,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具有时空双重维度:在时间维度上,生产力水平提升不断丰富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资本逻辑

^① 东方在历史上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西方(主要指西欧)相继经过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实际上,“封建”的涵义在东西方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主要指庄园制,意味着分权,而在东方主要指分封制,意味着集权),并从15世纪起开始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却长期保持着“土地公有制”,并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形成集中的“专制政权”,这三位一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变得“无时不有”;在空间维度上,世界市场扩大并成为资本控制社会的场域,资本逻辑变得“无处不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扩张密不可分,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目标,相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蕴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必然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各民族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

(三)“我们”对“我”的超越

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如何从“我”走向“我们”,即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增进社会团结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地看,从作为自我意识的“我”到具有社会认同意识的“我们”是私利与公益平衡与协调的产物。平衡与协调私利与公益是世界性难题,历史唯物主义对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从“我”走向“我们”。历史唯物主义内在蕴涵着公共性维度,这突出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主体、实践过程和实践目标上。首先,就实践主体而言,马克思揭示劳动异化现象,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对立的社会关系,将社会变革的主体定位于整个无产阶级。其次,就实践过程而言,“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6]马克思把它归结为普遍交往和社会分工。最后,就实践目标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一个生产资料共同享有、社会公平正义、打破利益对立的自由自觉的社会形态。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具有世界历史意蕴。“现实的个人”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在现实生活世界突出表现为“共在”。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作为自然生命的人,“只有当他进入了张开双臂拥抱他的社会世界的公共空间之中,他才成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内部共同拥有的一种公共性,它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17]马克思主张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共同利益,“在一个成熟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一个成员充分且公开运用理性去制订先天实践法则并遵守实践法则,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公共价值,既是公共性的基本标志,也是人们努力实现的目标。”^[18]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所蕴涵的公共性维度需要激活,才能发挥现实作用。

三、当代中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更要体现在思想理论方面。在笔者看来,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问题进行中国理论建构本质上是进行一种划时代的整体性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建构就是当代中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方向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蕴涵着超越旧共同体的丰富资源,同时也蕴涵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共同体思想,他们认为,国家作为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机构,人在其中是彼此相对立的个体,“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9]而要打破桎梏,就要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0]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建构的共同体是联合的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社会有机体,其本质是公共性。

21世纪是风险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现实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伟大构想,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21]从社会发展方式和阶段性特征视

角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经过动员参与期、利益分化期、诉求表达期,如今进入整合凝聚期。在这一时期,协调各种力量和各方面利益关系,寻求最大公约数,整合凝聚中国力量成为主要任务。^[2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现实的个人”这个社会历史前提的作用凸显,因此应该更加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对内,用公共价值和共同理想凝聚各方面力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3]建构公平正义的共同体;对外,坚持全世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思想,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联系起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根本目的就是建构“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24]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伊始就以公共主义为本质意涵,马克思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以公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目标。“现实的个人”和“联合起来的个人”在掌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能够证明“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的时代表达。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才能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进而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如今,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们正在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当前需要从文明的高度重新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何以可能。今天,尽管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执着追求,深刻改变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唯物主义不在于论证历史过程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而在于把历史选择与人民冀望统一起来。在21世纪,我们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推进实践创新中的理论创新。

在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途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中国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指明方向。当前,为了走出原子化个人和社会分化有余而社会整合不足的困境,必须探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人类”不是在对对应动物的语境中使用的,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我”与“我们”的意义上使用的。如果人真正是一种“类存在物”,那么就要现实地思考“人类”何以可能。“为了塑造一个反映我们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美好未来,共识至关重要。”^[25]作为“人类”,我们需要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翻版,更不是再版,而是新版。之所以说是新版,就在于中国开辟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6]如今,“历史终结论”终结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历史唯物主义在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的过程中体现和保持其时代性和发展性,在与人民群众共同命运的过程中体现和保持其阶级性和人民性,这是坚持、发展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过去,我们在实践创新的基

础上推进了理论创新,现在,我们依然要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建构“理论中的中国”和“思想中的中国”献计出力。

(感谢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潘虹旭在论文初稿写作和资料收集过程中的贡献)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 [2][3][4][5][8][12][14][15][16][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187、196、499、541、519、502、571、164、571页。
- [6]韩庆祥、张艳涛《马克思是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解读现实问题的:兼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方式》,《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 [9]孙亮《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问题”的三重建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30日。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 [13]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6页。
- [17]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符佳佳译,《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
- [18]晏辉《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前提批判》,《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 [21]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 [22]张艳涛、林倩倩《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特征》,《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 [24]朱云汉《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思考》,《人民日报》2015年7月9日第22版。
- [25]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5页。
- [2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9页。

[责任编辑:蔡永明]

On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ANG Yan-tao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History is a unique survival mode for humanity. People create human history; they are not only the playwrights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dramatic personae of history. However, in the prior efforts to underst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ant attention was given to its public dimens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If we wish to continue to write a new chapter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must develop and innovate 21st-century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Transforming from “I” to “u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re not only expressions of the era for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ublicity,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